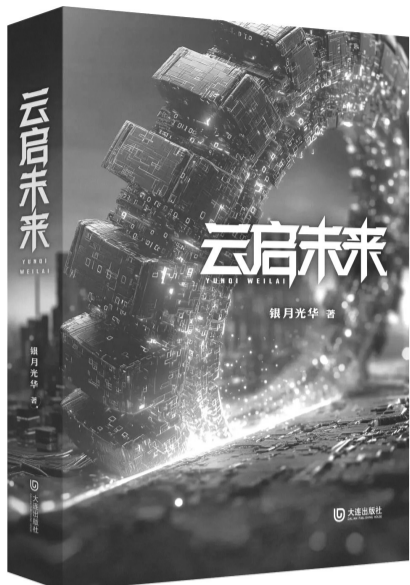


网络文学与工业叙事的双向奔赴

谢晓莹 许道军



在当下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中，著名网络作家银月光华的《云启未来》呈现出一种独具气质的冷峻与厚重。从《大国盾构梦》展现中国盾构事业发展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到《大国蓝图》书写三代科学家研制水下机器人的不易，银月光华始终保持对时代巨变的敏锐嗅觉，创作出深入当下生活、敢于“啃硬骨头”的工业科技题材小说。新书《云启未来》更进一步，不仅书写了机器的进化，更近似一场关于现代性、技术伦理与人类生存意义的哲学探讨，将网络小说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云启未来》以李墨曜的创业历程为主线，交织着老国营机械厂的衰落与新科技企业建设的突围。从文本技巧来看，《云启未来》是一部空间宽阔、结构复杂的工业科技史诗，展现出作家的宏大叙事把控力。故事空间在沪上的资本丛林、沈州的老工业基地、德国的工业城市之间肆意穿梭，叙事在现在与过去的时空中间环环跳跃，呈现出兼具科技畅想与人文浪漫的辽阔气象。

《云启未来》中李墨曜从繁华的沪上返回老家沈州，面对的不仅是老国营沈州第一精工机械厂（后称精机一厂）的遗址，还有两代人思想观念的隔阂。多年前，父亲在企业倒闭潮中试图挽救工作多年的精机一厂，对重振沈州工业抱有执念。李墨曜在不知不觉间走向同一条道路，最终决定将“高融合社区”试点从沪上挪移到沈州。故事极其细腻且充满张力地刻画了李墨曜的心理演变轨迹，从初归故土时的格格不入、审视与批判，到被迫卷入企业危机，再到逐渐理解故乡在转型期所经历的切肤之痛。

李墨曜与不同的资本巨鳄交锋，提出近乎乌托邦构想的“高融合社区”，推进以工厂、文创和住宅为一体的新型核心区域，以企业带动福利社区。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下，企业将匀出一部分利润，投入到社区建设中，缓解人工智能投入生产对人工的冲击，人人都能在社区中借助技术实现创造，并分享物质和文化成果。李墨曜提出的设想虽然大胆，但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处的未来并不遥远。《云启未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为工业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更新计划初步确立之后，一张恢宏的商业地图随着李墨曜的观察视野徐徐展开。从沈州精机一厂、众诚公司，到沪上科技公司蓝景、资本巨鳄深蓝、临港智汇未来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入局者各有执念，共同推动了李墨曜“高融合社区”的革新理念。作家凭借深厚的行业认知与扎实的笔力，兼顾了情节的可读性，详尽描摹商海沉浮的运作规律。书中的商业谈判、技术壁垒攻坚、团队利益分配、企业管理架构调整，乃至金融棋盘等各种力量的全局博弈，都写得惊心动魄。

小说的另一大亮点，便是对三代工业人的细腻描写，将不同时代工业人的精神特质、人生选择与命运轨迹，蛛网般编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鲜活而厚重的工业人群像图。

第一代以李墨曜的父亲李泰、贾铭章

的父亲老贾厂长等为代表，他们是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业人，忠诚、踏实、以厂为家，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工业建设。他们身上有不可磨灭的荣光，也有难以突破的局限，即对新技术抱有疑虑、对新思维态度谨慎。这一代人是工业的基石，他们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第二代以沈州自动化研究所的江道源、深蓝公司的谢向明等领导者为核心，他们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中坚力量，已经凭借个人的奋斗在科技之海中立足，并且仍在局中。第三代以李墨曜、岳扬等青年为核心。李墨曜是留德归来的技术精英，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有锐气、有傲气，也有脆弱与迷茫。他并非完美的英雄，有着普通人的犹豫与迷茫。最初他拒绝故乡，是从现实出发，不认为个人之力可以撼动社会变革，但深埋在内心的热血最终引导他走向了一条必然的道路。李墨曜在复杂的高海屡受挫，有过退缩的念头，他与传统网文大咖“金手指”的主角并不相似，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角色更加立体鲜活。他们身上承载着新一代工业人的理想与担当，也实现了中国工业精神的代际传承。

银月光华的《云启未来》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与问题场域，无论对创作者，还是对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都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次自我革新和突破。《云启未来》将目光拉回日常生活，直面当下科技与人共存的时代境况。这种主动将工业题材、科技内容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结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在目前仍较为少见，也似乎带出了网络文学高速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创作者应当如何书写当代人的共有记忆？网络文学题材还有哪些可供挖掘的路径？银月光华在《云启未来》中流露出对东北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他所描写的沈州正是许多东北工业城市的缩影。作家或许已经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从个人的记忆中挖掘支点，使之与集体关切相互交织。继茅盾《子夜》所代表

的上世纪30年代现代工业书写、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所描摹的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图景，以及新东北文学对工业转型的创伤记忆之后，工业题材小说行至当代，与人工智能、科幻元素融合，又有了新的变化。《云启未来》正是在网络文学场域中重新激活了现实书写传统，将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个体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为新时代工业题材网络文学提供了兼具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写作路径。

当下的新东北文学书写多聚焦于东北工业衰落之后的苍凉，从《白日焰火》到《钢的琴》，“铁西三剑客”班宇、双雪涛、郑执乃至新一代的创作者，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影视与文学作品，然而东北在复杂境况下生产出的富矿不止于此。《云启未来》不纠缠、不眷恋于当下东北文学书写的沉重与苍凉，为地域书写与工业书写都提供了新的可能。它拂去了铁锈，唤醒了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经奉献过的热血与荣光。在小说的后半程，那股扎根于地域深处的不屈不挠的热忱，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上风。作品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独特的东北：热情赤诚，爽朗洁净。它书写的不再是漫天风雪令人窒息的冷峻，而是充满破局勇气、颇具中国传统侠义气质的建设者之歌。

现实题材的网络书写是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新赛道”，它不仅仅提供新角度，也要提供新美学。“真实感”与“真实性”是其前提，但“爽感”也是网络文学的硬性“规定”。在《云启未来》中，这种“爽感”结合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延迟满足”，现实主义文学的“从脚手架看到大楼”的社会发展大趋势考察以及网络小说主人公的“金手指”和入设外挂，同时满足了网络文学和纸媒文学读者的双向期待。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美学，也是一种新的网络叙事探索，我们期待中国网络现实文学深入下去，与纸媒现实主义文学一道共同书写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并做到各美其美，双飞比翼。

守藏与渡海：翁万戈的文化乡愁

胡书明

作为晚清名臣翁同龢的玄孙，翁万戈（1918—2020年）横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文化的断层带上搭建了一座桥梁。近日《八十自述：翁万戈自传》出版，这不仅是个人生命历程的回眸，更是一个古老家族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剪影。

自传中，翁万戈以极其平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身世：1岁时被指定为翁同龢嗣孙，成为翁氏家族财产与收藏的继承人。在天津度过的少年时代，他接受了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之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然而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不得不远渡重洋，赴美国普渡大学继续学业，1940年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但他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出人意料地转入威斯康辛大学美术系，改学油画，家族的文化基因终究在他身上得以苏醒。

翁万戈一生最核心的使命，还是守护翁氏六代珍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翁万戈将住所命名为“莱溪居”。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在这里潜心研究家藏，撰写专著，接待来访学者。古建筑史专家傅熹年回忆1987年秋造访莱溪居的情景：“三日之间，观赏了他的大量珍品书画和古籍，听到他的介绍和评价，使我大长见识，也感受到了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和高度的鉴赏水平。”

晚年的翁万戈，开始为这批家藏寻找归宿。2000年，他将翁氏藏书80种542册转让给上海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刻本11种、元刻本4种，被学界评价为“有些书是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2010年，他将明代吴彬《勺园菴图》捐赠北京大学——勺园旧址即在校内。2014年以后，他又陆续将南宋梁楷《道君像》、明代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清代王原祁《杜莆诗意图轴》等捐赠或转让给上海博物馆。这批国宝级文物的陆续回归，为翁万戈的守藏使命画上了圆满句号。

作为一部自传，《八十自述：翁万戈自传》在叙事上极为简略，许多重要经历一笔带过，甚至有意留白。比如他1973年以《中国佛教》获亚特兰大国际电影节金奖，书中或许只是轻描淡写；他与司徒慧敏、郑用之于1946年在美国创办中国电影公司的事迹，也可能未及详述。这种“不着力”的笔法，让人想起中国传统文人的笔记——不求系统，不事铺陈，却处处透着言外之意。

翁万戈在自传中谈及自己的教育背景、事业经历，以及与历史事件和众多人物的交集，呈现了他从传统私塾走向世界舞台的人生历程。但读罢全书，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外在的成就，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从容与淡定。这种从容，或许来自名门之后的文化底蕴，或许来自对命运的坦然接受——既接受“继承家藏”的使命，也接受“流寓海外”的现实，更接受“文物归国”的必然。

翁万戈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守藏”与“渡海”两个词。守藏，是他对家族六代珍藏的守护与研究；渡海，是他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个人历程。他将翁氏藏书渡海带回中国，将中国影像渡海介绍给西方。

《八十自述》的结尾，他没有激昂的宣言，没有深沉的感慨，只是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这种平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曾引用高祖翁同龢题王翥《长江万里图》的诗句：“长江之图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典屋买画”是翁同龢的痴绝，而“渡海守藏”则是翁万戈的使命。两代人的选择，隔着一个世纪的沧桑，却在文化的长河中遥相呼应。

翁万戈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文化的传承，不在于固守于一城一地，而在于无论身处何方，都能让文化的光芒不灭。这或许就是他所说的“故乡存我心”的真正含义。

读到

淡笔写浓情

李海卉

萧红一生尝尽漂泊，简·奥斯丁安于一隅；一个在战火中书写生死场，一个在花园里雕琢家长里短。将张莉的《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与索菲·柯林斯的《她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并置，发现两位传主都曾用自身丈量世界，以淡笔写浓情，将琐碎日常锻造造成映照人间的棱镜。

张莉在解读萧红时，提出一个概念——“具身经验”式写作。萧红的写作不依赖纯粹的理念翱翔，她“扎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以热血、身体经验，去书写对世界的本真理解”。于是我们在《商市街》里触摸饥饿带来的胃部痉挛，那种“列巴圈”挂在门上而人已在饥饿中睡去的细节，是靠想象无法抵达的真实。张莉敏锐地指出，萧红的勇敢根植于她的“诚与真”——“那些以往不能入文的部分，她都要写出来”。

同样，当索菲·柯林斯用剪贴簿的形式呈现奥斯丁的一生时，我们看到的又是另一种“具身”——洗衣、做饭、缝纫的间隙里，在客厅的嘈杂声中，奥斯丁将书稿藏于吸墨纸下，持续着“两寸象牙上的雕刻”。她书写的是她最熟悉的事物：舞会、茶叙、散步、书信，以及三四户人家之间的“人情微澜”。这两部传记不约而同地为读者揭示：她们并非无力书写宏大，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让宏大从细节的缝隙中自然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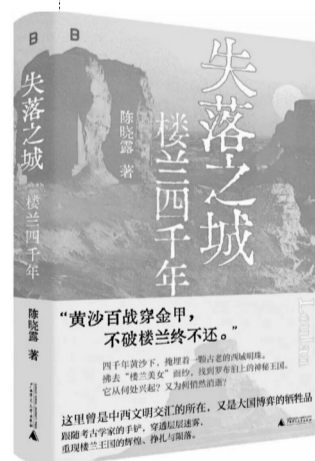
在分析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时，张莉提出“以淡笔写浓情”的笔法。最深的情感，往往需要最克制的表达。萧红写鲁迅，“在夜里，听得见鲁迅先生走路的声音，是轻轻的、稳重的”，不着一字赞美，而敬爱之情已从脚步声里传出。奥斯丁同样是一位“淡笔”大师。她在信中将自己的创作比作“精细的画笔”，人物的内心风暴往往被包裹在优雅的反讽与机智的对话中。柯林斯通过大量书信手稿，让我们看到这种风格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奥斯丁家族的通信充满了幽默的调侃与克制的温情，亲人之间从不煽情，却彼此支撑。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奥斯丁那双既冷静又温情的眼睛。

阅读、写作与行走成为奥斯丁理解世界的路径。这让我们想到萧红在呼兰河小城里的后花园，想到她和祖父的唐诗，想到火烧云的绚烂。她们的“淡”，并非情感的稀薄，而是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澄澈；她们的“浓”，不是刻意的渲染，而是生命经验自然结晶的光泽。萧红一生颠沛，从呼兰到哈尔滨，从青岛到上海，从东京到香港，她经历的是物理空间的“无数人间”。但她最终写出的，仍是记忆最深处的那座小城，那些放河灯、野台子戏的民间图景。奥斯丁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格兰乡村，活动半径极为有限，却在在这“两寸象牙”上雕琢出一个时代。

萧红和奥斯丁，一个在漂泊中守护童年记忆，一个在静居里雕刻时代肖像。她们以有限书写无限，以琐碎映照永恒，以淡笔包裹深情。怀念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她带进我们的中间，让她的文字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生长。只有从血肉中生长出的文字，才能穿越时间，成为一代代人“会带回家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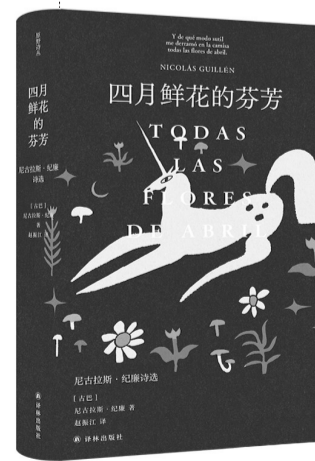
荐书

失落与寻找



《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汉代西域枢纽，楼兰在20世纪初被发现重回人们视野。本书作者陈晓露有20年考古专业经历，长期工作在田野考古一线，对西域及中亚文化交流考古颇有心得，在书中基于大量文书、壁画及古城遗迹，讲述了楼兰的历史、楼兰遗址的发现以及关于楼兰的最新考古成果。



《四月鲜花的芬芳：尼古拉斯·纪廉诗选》
译林出版社

尼古拉斯·纪廉是古巴民族诗人，他大胆运用非洲音乐舞蹈旋律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开启了新的维度，是拉丁美洲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深受马尔克斯等人的赞誉。这本书为纪廉诗歌精选，由西班牙语资深译者赵振江编选并翻译，集中体现了纪廉的诗歌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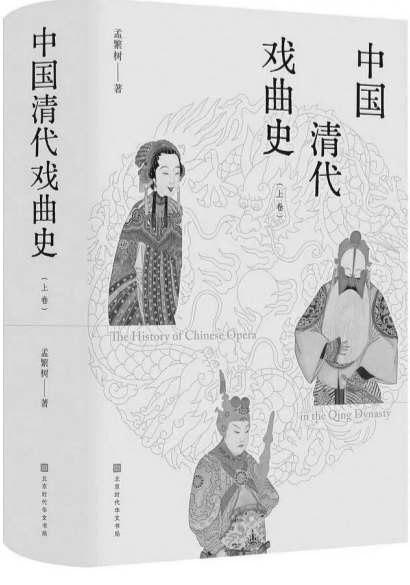


《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
中华书局

自唐代，在中央集权下发展成熟的职业官僚体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对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运转，乃至当今的社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固刚是国内著名的唐史研究专家，在唐史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花雅并重：重构戏曲史的“下半阙”

何兴权



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版图中，清代无疑是最为复杂的一段。这一段跨越近三百年、支系庞杂的戏曲发展史，既是传奇的余晖，又是地方戏的曙光；既是文人案头剧的绝响，又是民间舞台艺术的狂欢。作为新中国首位戏剧博士，孟繁树以其四十余年的学术积淀，书写了一部视角宏

阔、考证精微的清代戏曲全史。《中国清代戏曲史》（全两卷）这部著作独特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对中国戏曲史叙事的结构性重构——将长期被忽视的“花部”地方戏纳入历史主流，真正实现了戏曲史研究的“下半阙”书写。

中国传统戏曲史研究长期存在一种“文人中心”的偏颇。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到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学者们多以文人传奇、杂剧为研究对象，以文学性为评判标准，这使得清代中叶以后蓬勃兴起的地方戏长期被排斥在学术视野之外。《中国清代戏曲史》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从结构上彻底打破了“雅部中心论”的桎梏。全书上卷九章聚焦清初至中期，对李玉、李渔、洪昇、孔尚任等文人大家进行了精到分析，但这并非简单的作家作品罗列，而是将其置于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中加以考察。更具匠心的是，作者将清初戏曲定位为“中国戏曲艺术的第三个高峰”，这一判断本身就意味着对清代戏曲整体地位的重新评估。

而下卷十二章的布局，则彰显了作者真正的学术雄心。当叙述进入清中期以后，孟繁树将目光转向地方戏曲的勃兴，

着力揭示梆子腔、皮黄腔的形成与演进脉络，对弦索腔系统及莆仙戏、梨园戏等古老剧种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这种“花雅并重”的叙事结构，使全书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既不失文人戏曲的精致，又为民间的、声腔的、表演的戏曲留出了足够的学术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完成了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戏曲文学史”走向真正的“戏曲艺术史”。

如果说“花雅并重”的视角是《中国清代戏曲史》的方法论突破，那么对板式变化体戏曲的系统研究，则是其最具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孟繁树早年即以《中国板式变化体戏曲源流研究》奠定学术地位，而在这部通史性著作中，他将这一研究成果融入对清代戏曲整体演变的考察，形成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孟繁树并非孤立地研究声腔技术问题，而是将其置于“花雅之争”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书中详细梳理了清中叶的两次花雅之争，揭示了板式变化体戏曲如何在宫廷与民间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主流。这种将音乐形态学与戏曲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使得声腔流变不再是枯燥的技术史，而成为理解清代社会变迁与

文化权力转移的重要入口。

《中国清代戏曲史》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它对“整体戏曲史”理念的成功实践。在这部著作中，戏曲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门类，而是与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密切互动的有机整体。从宫廷到民间，从京师到边疆，孟繁树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细致，还原了清代戏曲的完整生态。这种对演出制度、剧场空间、观演关系的关注，使得“戏曲”不再仅仅是剧本上的文字，而成为活生生的舞台艺术。

书中对福建莆仙戏、梨园戏等古老剧种给予关注。这些剧种地处东南一隅，却保存了极为古老的戏曲形态。孟繁树将它们纳入清代戏曲的整体图景，既彰显了地方剧种的独特价值，又揭示了戏曲发展的区域差异与互动关系。

清代戏曲既是传统的终结，又是现代的起点——京剧正是在这一时期孕育成熟，并在此后一个多世纪成为中国戏曲的象征。理解清代戏曲的演变逻辑，对于认识当代戏曲的困境与出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书中对梆子腔、皮黄腔形成过程的揭示，为当代戏曲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